

# 蔣總統力行認識哲學之研究

林有土

## 目次

- |                    |             |
|--------------------|-------------|
| 一、引言               | 四、力行認識哲學之內涵 |
| 二、哲學的一般概念          | 五、結語        |
| 三、力行認識哲學的思想淵源與時代背景 |             |

## 一、引言

國父奔走革命，歷經艱險而能百折不回，愈挫愈奮，所憑藉者乃革命者的信念與道德勇氣，亦即革命的精神與信心。蔣總統繼承國民革命大業，也特別看重革命精神的力量。我國民革命，歷經推翻滿清，完成北伐，抗戰勝利，每一次歷史新局的開拓，革命高潮的再起，莫不以劃時代的心理建設運動為前導，亦無不以國民合成心力的動員為基礎，現今，我國在國際逆流衝擊，姑息氣氛瀰漫下，復興基地日益強大，仍以心理建設為根本憑藉。國父創立「孫文學說」，蔣總統繼承革命大業，昌明「力行哲學」，其目的均在奠國基於方寸之地。國父嘗言「心者萬事之本源也」，「建國之基，當發於心理。」可知心理建設不僅為做人的根本，亦為立國的基石。國父又說：「有志者事竟成。」蔣總統更強調：「心理建設乃革命事業之基礎。」執政黨十屆五中全會通過了「現階段心理建設之檢討與策進」一案，就是在使全國軍民人人能在心理建設上「先奠國基於方寸之地」，使全國軍民的一切思想和行為，趨於共同的革命目標，導致全國軍民意志力的集中和激揚，發為革命事業必勝必成的革命精神動刀。

值此事局維艱，瞬息萬變之時，全國同胞，於蔣總統逝世後，發揮了堅強無比的民族團結力量，今後當恪遵蔣總統遺命，益加堅守信心，加強團結，發揮「有志竟成」與「力行實踐」的革命精神，實行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早日達成國民革命的神聖任務。

加強現階段心理建設的策進，首重國民精神建設，那麼就先打破國人「知之匪艱，行之惟艱」之心理大敵，使人人貴知重行，養成奮發有為，積極進取，力行創造的風尚，並使全國國民都知「知」之「難」而能「篤信」主義，知「行」之「易」而能「力行」主義。蔣總統繼承國父革命大志，為了破除國人思想迷津，勉人真知力行，闡揚「知難行易」學說，策進心

理建設的成效，創立了「力行哲學」，這不僅奠定了革命精神教育的基礎，也是哲學思想上的一大展拓。

力行哲學，又稱「行的道理」，一名「行的哲學」，是蔣總統於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所講的一篇訓詞。這是蔣總統在哲學思想上最重要的結晶，哲學史上一直紛爭不息的「知」與「行」關係問題因而得到解決。知與行在哲學上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哲學的根本問題，歸根究底都在知與行兩方面上。哲學的領域在窮宇宙萬物之理，宇宙是不息的進化，而宇宙的最高進化是人，人為萬物之靈，為宇宙的主宰。同時人的最高進化又是心。人心有異有同，人心同者為性，人性有天生有習得，人性天生者為命。惟行為性之表，知是性之能，故人類心性的進化在知與行。人生的過程，全是知與行交互循環的作用，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也全靠真知與力行的交互作用而日益充實。我國哲學就是告訴人如何去求知，如何去力行，如何因知而行，如何因行而知，不論是在宇宙方面或者是人生知識方面，都在說明行的道理。西方的哲學，雖然通常分本體論、宇宙論、認識論與人生論四方面來探究，但都可從行的道理得到圓滿切確的解決與說明。蔣總統的力行哲學在知的關係上，不但從力行以證明行易，更進而根據力行以打破知難的難關。從國父之「孫文學說」的結論：「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有志竟成」，進而發揮為「不行不能知」。所謂不行不能知，就是要從力行中去求得真知，凡事必力行後方有真知，也唯有從身體力行以求知，才能突破知的難關，也唯有如此求得的知識，才是真知識。知難，故倡力行以勉其為難，以克服其難；因行易，故倡力行以證其易。故蔣總統的力行哲學實是闡揚與發揮國父「知難行易」學說的偉大成果。

力行哲學，體大精深，本文擬就知行哲學方面加以研究，分哲學的一般概念，力行認識哲學的思想淵源及力行認識哲學的內涵三大部份加以說明。

## 二、哲學的一般概念

### (一) 哲學的意義

何謂哲學，自來學者不一其說，想用簡單的定義，說明哲學的概念，實非易事。哲學的語源，源自希臘，合「愛」與「智」而成「愛智」。哲學之本義即為「愛智」之學。但是實際上將哲學一詞應用到學術上來的，實為蘇格拉底。他說：「我固知我之愚，但我愛求智，我非智者，我乃愛智者也。」這句話就是說為知識而求知識的意思。由此，可知哲學在西方，原是一種努力求知的愛智活動，也是努力求知的思想歷程，起因於人類的思索驚疑與好奇心，目的純為滿足追求知識慾望。因而，西方學者，對哲學的解釋，差不多都是自「智」與「知」立言的。譬如：柏拉圖說：「智者真正智識之謂也，所謂哲學，即修得此真正智識之謂也。」亞里斯多德說：「哲學為研究宇宙一般原理原則及究竟因之學。」斯多噶學派也認為「哲學為一切理論的智識及有關實踐道德之智識的總稱。」而伊壁鳩魯派之始祖伊壁鳩魯則以為哲學為「幸福之合理的追求。」此後，哲學的內涵

隨時代而演變，哲學的定義，亦因哲學研究範圍的發展而愈趨繁衍。譬如，到了羅馬共和時代的哲人希塞羅讚頌哲學說：「嗚呼，哲學，所以誘導人生之爲德而去不德者也。人苟無哲學，將何以爲人乎？」由此，哲學的概念由愛智的活動轉變爲躬行實踐之道德觀念。到了新柏拉圖派又以頓悟直覺的神秘知識爲哲學。中世紀，哲學與神學混爲一談。耶穌教義亦即哲學，那麼實際知識變爲超自然的知識，理性的了解與信仰的神學相提並論，哲學觀念又一轉變。到了十七世紀初期的笛卡兒乃以爲哲學之名乃指對於智慧的研究，力言一切知識出自於理性。培根更認爲哲學就是理性之學。後來，霍布士認哲學爲研究因果關係之學。經驗主義派的洛克以爲哲學就是對事物真正之認識。把物理學稱爲自然哲學，而將哲學與科學混爲一談。到了康德才把哲學與數學分開，他說：「一切認識由於主觀的觀察，不外是歷史的或合理的，前者由經驗的資料而出發，後者由原理而出發。但是合理的認識亦有二種：一是基於概念，二是基於概念的構成，前者爲哲學，後者爲數學。」他確定了哲學的內容，爲「有」即自然哲學與「應有」即道德哲學兩類。自然哲學屬於理論哲學，是一種認識的哲學；而道德哲學屬於實踐哲學。直到現代，德哲溫德仍以學的觀點而確定哲學的意義，他說：「哲學爲綜合各種科學的知識以組成一不矛盾的體系的學問。」這種說法已顯示了從現代科學觀點界說的時代意義了。總之，在西方哲學的意義表現在人類努力求知的思想歷程上，所建立整體系統的學問。

中國初無哲學其名，今日所謂哲學一詞，實爲日本人西周氏所創譯的。中國襲用哲學之名，雖始自清末，但「哲」字早已用之，如「哲人」、「哲人其萎」、「哲王」、「哲嗣」、「既明且智，以保其身。」等等，都是自古以來慣用的詞句。中國古代雖無哲學之名，却早具哲學之實，譬如老、莊的道術，魏晉的玄學，宋、元、明、清的理學、道學、義理之學，現在都統括名之曰哲學了。不過傳統的意義，哲學據爾雅釋言，訓爲「智」也。尙書皋陶謨稱「知人曰哲」。學字，據尙書大傳，釋爲「效也」；白虎通則謂「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不知也。」說文，數，亦釋「覺悟」也。因此，從把「學」字釋爲「覺」與「效」看來，覺屬自己內心的覺悟，偏重在知的方面。效是仿效外在他人的行爲，偏重在社會的風習方面，也就是「行」的方面。所以傳統上，學的意義，可以概括人在宇宙間一切覺悟於內而效法於外由未覺到覺、未效到效的全部活動。今在學上加一「哲」字，似有偏重於智方面的學的意義了。這樣，跟傳統「學」包括「知」與「行」兩方面的解釋有點不同了。其實中國所謂智，不僅指人之求知之成果，且指人之一種德性、一種能力，原含有整個人類美德的意思。一位智者、哲人，不但是一位富有智識，而且求智不息，自強不息，知得做一個完人的道理，能够勇猛精進的做一個完人的人。所以在中國哲學是指人生境遇澈底的反省。由此可知西方哲人着重於「愛智」，中國先賢則着重於「樂道」。愛智是一個努力求知的思想歷程，爲智識而求智識；樂道乃是對人生境遇澈底的反省，爲行道而樂道。

國父對於哲學的解釋，非常簡明精闢，那就是「判斷」二字。他說：「考察（宇宙現象）方法有兩種，一種用觀察，即科

學；一種是用判斷，即哲學。」①所謂判斷是由客觀事物與主觀思維相結合而成，換句話說就是將兩物或兩個以上的概念相互比較以認知其異同，而決定其關係的一種思想。思想就是判斷，而一種判斷就是一種思想的貫通，一種知識，我們的智慧生活，無時無刻不有判斷，人類知識的種類雖然無限，但無不是由判斷來貫通，和來說明的，可以說無判斷即無知識。在這裏，我們明瞭 國父對哲學及其方法的說明，「用判斷即哲學」確實異常精闢。蔣總統對於哲學更有賅括確切的解釋，就是「哲學就是窮理明德的學問，其效則見於誠意正心修齊治平之中；而研究哲學亦就是爲着要做誠正修齊治平之事。現在我還要補充一句話，窮理的目的在於致知，明德的工夫在於修身，修身的效驗，在於知與行之中，方可驗得的。所以研究哲學，亦就是要解決人生與革命一切知與行的疑難問題。」② 蔣總統這一簡明確切的解釋，既概括了哲學的涵義和功能，且亦闡揚我國固有哲學的傳統，而不落於一般承襲西洋哲學的窠臼，它是智德兼修，知行並重的，綜合了古今中外對哲學界說的思想。所謂「窮理」，就是即物而窮其理之所在，「窮理在格物，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③所謂「明德」就是爲明先天之德與究人禽之別。「明德在研幾，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④ 蔣總統這一哲學的意義，跟 國父的說法在形式上似有不同，在本質上却完全一貫，因爲「窮理之學」實即一種「事實判斷」的哲學，包涵「質量」、「因果」與「是非」判斷的哲學，而「明德之學」又不外乎是一種「價值判斷」的哲學。因而，蔣總統所謂「窮理明德之學」，實在是弘揚 國父「用判斷，即哲學」的精髓。

#### (二) 研究哲學的價值

我們研究哲學，到底有什麼價值？哲學對於人類有什麼貢獻？目前有許多人都以爲哲學烤不出麵包，無補於治世，毫無價值可言。這些人輕視哲學的理由，不外哲學無補實用；哲學是深奧難解，枯燥無味；哲學乃家說紛紜，莫衷一是以及哲學已日漸爲科學所代替幾種說法。這幾種說法，表面看來，好像很有道理，但仔細分析起來根本不成理由，實際上乃是由於這些不明哲學真正價值所致。其實哲學爲科學之母，哲學的目的是將科學的知識，組成全體的知識，部分的真理合成整個真理。科學見其偏，而哲學見其全。科學見其細，而哲學見其大。科學見其分，而哲學見其合。科學重實驗，而哲學重說明，哲學有其研究的任務，不能用科學代替，哲學雖然不能供給人類物質的資料，却大有裨益人類精神之生活。至於哲學之所以高深難懂，枯燥無味，乃是哲學的敘述方法問題，而非哲學本身內容問題。總之，哲學在闡明認識宇宙、人生的本質，以確定真理的基礎以及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哲學的研究，不但對人生的關係重要，就是對於治學，亦極爲重要，不論研究任何學問，從事任何工作，學習任何東西，都要懂得哲學。因此研究哲學的價值，我們可綜合歸納，列舉下面幾點來說明。

1. 哲學爲一切學問研究的基礎。「哲學爲一切學問之本，……哲學之重要，如同人生一日不可須臾離的空氣一樣。」④因爲「哲學之所以可貴與其力量之偉大，就在他有窮究宇宙，調理萬物的精神，尤其對於人生的究極與解決人生一切問題，更非哲學不可。」④而且「只有哲學方能窮究宇宙真理，和闡明宇宙本源，而其科學的終極，仍非借助於哲學爲之補救不可。」

⑤一切學術，除哲學外，皆不超出科學與文藝兩大範疇。然古代文藝與哲學不可分，我國嘗言「文以載道」，所謂道即指哲學而言，文藝常隨哲學思想的轉變而轉變，哲學是文藝的靈魂，也是文藝之本。至於科學乃起源於哲學，哲學又綜合科學之精華，哲學為科學之科學，也是科學之本，所以說哲學為一切學問研究之基礎。

2. 哲學是研究立身做人的道理。「研究哲學的中心問題，其最主要目的，還是在研究人的問題，第一研究如何才得稱之為人，第二研究如何做人的道理」②所以「哲學是我們人人必有的基本知識，不懂哲學的人，一定不懂人是什麼東西，亦不懂人生的目的和做人的道理，根本就不知道做人。」⑥一個有哲學修養的人，才能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堅強意志，勇敢地負起應負的責任，絕不遲疑。「如果沒有哲學的基礎，在倫理上、政治上，就沒有確定的人生觀，臨到危險的時候，就難免變節，臨到富貴貧賤轉變的時候，也難免變節。」⑦故無論古今中外成大功立大業的偉大人物，必有其高深的哲學修養，做為安身立命的基礎。

3. 哲學是研究人類生死與苦樂的問題。「我們研究哲學的第二個目的，乃是要解決人生的生死與苦樂問題。」②而「生死與苦樂的問題，乃是研究哲學的重要目的，我以為唯有在哲學中，方能求得這個問題根本解決，而不是只在宗教信仰中可解決的。因為哲學是求真理的，而宗教的信仰問題，亦不能捨棄哲學的。如果哲學僅僅研究心理理智，而不能解答這個關於人生最密切的問題，那對於研究哲學，就無重大價值了。」②同時「哲學是求得安樂的學問。」②哲學修養首重集義養氣，配義與道，具有哲學素養，自然事理明白，信仰堅定，凡事只須「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就是辨別是非，明白應該做與不應該做，對於生死苦樂，瞭然胸懷，而無所疑慮，一切不愧不作，無憂無慮，自然無往而不自得。正如詩云：「誰為荼苦，其甘如飴」文天祥也說：「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4. 哲學是革命實踐的動力。「革命不是隨便的衝動的事情，一定要有個革命哲學做基礎。」「有哲學基礎的，就一定有肯定的思想，亦就一定有中心信仰的人。有了中心思想和信仰，對於一種主義至死不二，這才可以算是革命信徒。」⑦為何哲學是革命實踐的動力呢？一因哲學在於立信，而革命須有信心，沒有一種哲學不在培養人類的信心。從事革命的人，一定要有堅定不移的信心，才能貫徹革命，不致於中途變節投降。所以要增加革命的信心，必須研究哲學。其次，革命是要實行主義的，而要實行主義，就不能不知主義所依據的原理，亦即不能不知主義之哲學基礎。實行革命主義，一定要有革命哲學做基礎。所以以要革命，必須研究哲學，確立革命之哲學基礎。哲學既能培養革命信仰，又能貫通主義的思想，確立革命的哲學基礎，所以哲學是革命實踐的動力。

5. 哲學是領導青年的基礎。「我們要真能引導青年，真正獲得青年的信仰，就必須有哲學作基礎，人人要具有哲學的涵養與認識，否則便不能達到領導青年的任務。」④因為「我們如果從事其他社會、政治與經濟的工作，還可以偏重於技術與方法

，但是我們要做領導青年的工作，要担任青年的教育與訓練，那就不是專講技術與方法所能達到目的，而必須要有正確的哲學基礎。」④無疑「現在一般……對於學術與修身，已多能逐漸注重，且能實踐自修，然而其能有真知獨到的哲學修養，能視哲學為一切學問之本，而知道哲學之重要，如同人生一日不可須臾離開的空氣一樣的人，還是很少。」④因此之故，蔣總統特別訓勉高級幹部說：「我對於今日一般高級幹部的哲學修養，認為比任何學術與工作更為急要。」「這特別是在成敗生死當頭的時候，關係更大。」②所以要達成領導青年的任務，必須研究哲學。

6. 哲學是立國救國的基礎。「近世以來，我們中國的哲學之所以不能發達進步，因而影響到國家民族不能獲得永久的獨立自由，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④為什麼呢？因為：「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獨立的哲學，或有了獨立哲學而不能發揚光大，乃致湮沒不彰，那這個國家必無以生存於世界，終久要被人滅亡。我們中國近百年來國家社會之所以衰弱不振，推本窮源，民族學式微與學術思想之不競——要為最大原因。我國獨立哲學沒有發揚，以致教育失了重心，人心失了指針，教育廢弛，人心萎靡，國家自然趨於衰弱。要挽救這個危機，祇有趕快復興固有的獨立哲學。」④而且「凡是一個獨立國家與民族之所以有其獨立的哲學，就是因為他有他的獨立天性與精神的緣故。」④所以「無論那一個國家，那一個民族，外在內在情勢壓迫下，要想恢復起來，必須先有哲學作基礎，必須他的哲學先要能夠獨立發揚起來。」④「我們過去所以遭受這樣慘敗，就是沒有哲學的基礎，等於卸除了武裝一樣。……所以今後，必須重新把精神武裝起來，重建我們中心思想——哲學基礎。」④總之，哲學是國家的靈魂，「立國不能沒有哲學，革命要能成功更不能離開哲學。」我們要重視哲學之價值及其力量之偉大，用獨立的民族哲學以端正救國立國之本。

我們研究哲學，除了上面所說的六點價值外，因為它是根本原理，與通變達用的探究，所以還具有擴張深遠的眼界，訓練精神的思想，革除武斷的態度及養成研究的精神幾種特長，由此更可見哲學之價值以及對於我們關係的密切了。不過，哲學這些價值與特長，並非空談所能獲得的，而是要力行才能實現的。因此，我們研究蔣總統的力行認識哲學，更顯出其遠大的重要性了。

### (三) 一般哲學的範圍

一般哲學的研究範圍很廣，可以科學為界限。科學發達以前，哲學的研究範圍較廣；科學發達以後研究的範圍較狹。大體說來，就哲學思想之本質而言，它是各種知識的思想根源，舉凡人生全體，自然現象以及常識，科學與純哲學等知識和道德、宗教等問題，窮究其本質或價值之所在，都屬於哲學的研究範圍。然若就哲學思想本身的形式而言，哲學所討論的範圍，歸納起來，不外乎宇宙問題、知識問題與人生問題三大方面。研究宇宙問題的是形上學，包含本體論與宇宙論，兩者構成了自然哲學，也叫宇宙哲學。研究知識問題的是知識論，包括邏輯、認識論、方法論，構成了方法學，也叫認識哲學。研究人生問題的

是人生哲學，包括心靈哲學、價值哲學、社會哲學等，乃構成了精神哲學，也叫人文哲學。不過，哲學的研究，往往因時、因人、因地而有所不同，尤其哲學之概念隨着時代的不同而變遷，科學未脫離哲學而獨立之前，哲學包括科學。科學脫離哲學而獨立發展以後，哲學的範圍日漸縮小。西哲對哲學的分類多屬二分法或三分法。其他尚有多分法的，把哲學分爲形而上學（宇宙哲學）、認識哲學、人生哲學、道法哲學、教育哲學、歷史哲學、宗教哲學、美學等等。可說因人因時而異。

至於中國哲學的分類法，大多採多分法。胡適之先生編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分哲學爲六類：宇宙論、名學及智識論、人生哲學（倫理學）、教育哲學、政治哲學、宗教哲學。馮友蘭先生編「中國哲學史」，表面上採三分法，將哲學分爲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但在宇宙論中又分本體論、宇宙論；人生論中又分心理學、倫理學、政治社會哲學；智識論中又分知識論、論理學，同時還提到美學，這樣的分類也屬多分法。范錫教授著「哲學概論」，表面上也採三分法，把哲學分爲一般哲學、特殊哲學與應用哲學三類，實際上一般哲學又分認識論、形上學、人生論；特殊哲學也分道德哲學、宗教哲學、藝術哲學；應用哲學則分社會哲學、法律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哲學、教育哲學、歷史哲學多種，也屬多分法。唐君毅先生則依中國固有之哲學名詞分哲學爲四大部，即名理論、天道論、人道論與人文論，並配合印度與西方哲學所研究的範圍而歸類，涵蓋較全，亦屬多分法。

#### (四) 研究力行認識哲學有關的重要文獻

力行認識哲學乃探討哲學中有關知行的問題，包括西方的知識論與知行論。蔣總統有關這方面的著作及言論，最重要的是「行的道理」。其他還有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講述的「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南京軍官學校講述的「革命哲學的重要」，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廬山軍官團講述的「革命心法——誠」。民國三十年七月九、十日對青年團中央幹事會講述的「哲學與教育對青年的關係」，民國三十九年六月十一日在陽明山莊講述的「實踐與組織」，民國三十九年七月三十日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講述的「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民國四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發表的「反共抗俄基本論」，民國四十四年七月五日及十二日對革命實踐研究院黨政軍幹部聯合作戰研究班第三期研究班講述的「革命教育的基礎」（一名革命哲學入門）。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日講述的「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另外科學的學庸、中國之命運，以及國父的遺教如孫文學說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資料。力行認識哲學的研究，也以這些資料爲主要範圍。

### 三、力行認識哲學的思想淵源與時代背景

#### (一) 思想淵源

蔣總統力行認識哲學之研究

從 蔣總統有關哲學的論著言論中探尋，我們可以瞭解 蔣總統創立力行認識哲學，其思想淵源可歸納為三點：一是因襲我國固有之道統；二是參酌中外哲學、宗教與科學的學理；三為實踐「知難行易」之良知而獲真理。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 1. 因襲我國固有之道統

蔣總統自六歲至十六歲讀經治史，後來又從顧葆生先生治經學與哲學。從十八歲起研讀陽明學說，他說：「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我是自十八歲從顧葆生先生時候起，就開始研究的，以後五十年來，更曾經讀了再讀，研究了再研究，他的『傳習錄』與『大學問』這兩個小冊子，真是使我百讀不厭，心嚮神馳，不知其樂之所知。」②所以從近處看，力行認識哲學實導源於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而後 蔣總統追隨 國父革命，二十八歲時 國父為他講明「大學」的價值，其思想自然受國父影響，因而他自己說：「再就本團裏的哲學思想來講，我最初就得益於王陽明『知行哲學』的心傳；後來追隨 國父，服膺三民主義，從事革命事業，更是實踐『知難行易』的學說，而名之曰力行哲學。」④ 國父的革命哲學「是由中國固有的哲學而來的，是集三代以來中國哲學之大成的。」④中國道統之相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及乎 國父革命則斷而能續， 蔣總統繼 國父遺志，紹箕道統，可謂一脈相傳。可見 蔣總統的力行認識哲學不但綜合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哲學與 國父「知難行易」學說，而且也繼承了我國一脈相傳的道統。

### 2. 參酌中外傳統哲學、宗教與科學的學理

力行認識哲學除了因襲我國固有道統外，還參酌摘取中外傳統哲學、宗教與科學的學理。儒家的宗教思想是承認天與神的存在的。蔣總統曾引述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說法來說明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為有神論。他說：「我們必須承認宇宙之中，是有一位神在冥冥之中為之主宰的。並且他是無時不在每一個人的心中，而不待外求的。我可以說，這就是我們『天人合一』的哲理。這哲理乃是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而不變的傳統精神。」⑤雖然 蔣總統主張有神論，但反對宿命論，他的宗教觀主張「發揚人性中之良知良能，堅定其自信心，倍增其責任感，一視義理所在，而量生死得失於度外。」⑤這種對超越個人生命之道的信仰，正是一種道德的宗教觀，也是「天人合一」的最高表現。西方基督教士林哲學有所謂「人性有天理，人心有造物主所定的性律（道德律）之主張。」⑧佛家認人心中皆具一「真如」，佛說：「異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着，不能證德。」⑨因之佛教與基督教皆有明心見性，存天理去人欲之說，這種宗教哲理顯與我國「天人合一」的宗教哲學相互輝映。蔣總統認為陽明「心即理」之說，是講心有主宰，而且這個主宰就是自己的良知。那麼跟基督教的「聖靈即在吾心，吾心即是聖靈」及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所指心即主宰的說法相似。我國哲學本有一脈相傳的統緒，因推演遞嬗，已成龐大體系，擷取外來宗教哲理，乃為參證互相發明之用。正如 蔣總統所言：「就宗教來說：中國固有的人生哲學，經孔子的創導，孟子的闡揚，漢儒的訓釋，自成為崇高的體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別的哲學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中華民



族仍虛心接受外來的宗教，且能够擷取外來宗教精深的哲學，使其與中國固有的人生哲學互相發明。」<sup>⑩</sup> 蔣總統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一生精研宗教哲理，自然其思想也參酌擷取了西方的宗教哲學思想。

因為哲學與科學的關係十分密切。蔣總統的哲學思想參證西方哲學與科學的地方，也十分顯現，例如他基於易經的天道形上學而闡釋「心物合一」論，乃徵緒西洋哲學大師羅素及懷黑德的「中立一元論」與戰後科學的發明而無誤。故他說：「我們總理民生哲學思想，乃是不偏於唯心，亦不偏於唯物，而以民生為歷史進化的重心，可說是綜合心與物二者的最高理想。這與近代哲學界「中立一元論」完全相合。……這種理論自從原子分析的方法發明後，更收到具體的發明。……現在原子的分析，亦已證明質與力的界限已不存在，也就是證明物與心已歸於一元。」<sup>⑪</sup>另外關於宇宙與人生法則，所謂「力行有起點，有順序，有目的，是經常恆久的」，都可從宇宙天體的運行與地球生物與人類進化找到確證。足見蔣總統的思想立論，處處參證了中西哲學、宗教與科學的學理。

### 3. 實踐「知難行易」之良知而創獲之真理

蔣總統幼聆庭訓，刻苦自勵，及長承志移孝作忠，以天下國家為己任，以救國救民為職志，追隨國父革命凡二十年。國父以畢生之精力具盡瘁於救國救民的革命大業，乃發自「救亡圖存」之良知，因此他終生所抱持之三民主義也就是為達到救亡圖存之目的而創立的救國主義。蔣總統以既有之「為國盡忠為民族盡大孝」之良知，復受國父精誠感召，更能一心一德躬行實踐革命主義。因為中國幾千年來在人們的心中有一個獨斷而有毒的大敵，那就是書經上所說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因為這個根本謬誤的思想強固在我國歷代社會各階層，阻得了我國文化之進步，也妨碍了國父革命之建設工作，因此國父倡導「知難行易」的學說，破除這個思想上之謬說，以利革命工作之進行。蔣總統在革命奮鬥的過程中，體悟到「知難行易」學說的道理。他認為革命所抱持之三民主義，乃係先知先覺，殫精竭慮所發明的良知灼見，未必人人都能瞭解，但實行主義的良知是人人具備的，只要國人能致自己愛國救民之良知，切實奉行主義，革命奮鬥，則完成救國救民任務並不困難。因此他發揮了國父的學說，主張「不行不能知」。唯有這樣才真正體認三民主義之崇高與偉大。由此可見蔣總統的力行認識哲學，是他一生努力實踐「知難行易」的良知而創獲的真理。

### (二) 時代背景

任何一種思想學說的產生，不但有其淵源，更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蔣總統說：「我們要知道做人做事的根本道理和方法，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認識我們現在的時代，一個人如果不認識他所處的時代，無論他能不能獲得有用和高尚的學問，即令他的學問經驗怎樣好，亦不能成就大的事業」。<sup>⑫</sup>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力行哲學也因著時代而產生，是針對時弊而創發的，然而其時代背景究竟如何呢？蔣總統在反共抗俄基本論中曾將國民革命的歷程劃分為三期，並指出各期革命的對象

與本質，我們依此可以尋出其力行哲學形成的原因。

自壬辰至辛亥，凡二十年，乃是國民革命的第一期。革命的對象是滿清。革命的本質是政治革命，亦即民權革命。滿清末造，內政腐敗，外敵入侵，滿清政府無變法維新自強與民更始之誠意，且變本加厲，持「寧贈朋友，勿予家奴」之做法，使國家淪為次殖民地的地位，有亡國滅種之憂。國父有鑑於此，認救亡圖存之道，惟有推翻滿清。因此他建主義為標的，定方略為歷程。他並指出：「專制時代，人民之精神及身體皆受桎梏，雖欲為國民之嚮導，然獨行而無與從，雖欲為國民之前鋒，然深入而無與繼。故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之勢力外，不能不兼注意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為必要也。」<sup>⑬</sup>國父「知難行易」學說就是為了解除專制時代人民身心之束縛，以利革命方略的推行。學說雖完成於民國七年，但其思想之建立，實植基於七年前之時代背景。蔣總統亦曾指出：「因為國父生在滿清末年，與王陽明在明季一樣，同是看着中國人中了幾千來「知易行難」學說之毒，一般士大夫不是學漢儒解經，就是學宋儒講性，結果只是空疏迂闊，無補實用，所以王陽明便用「知行合一」的學說，來醫治當時中國的民族性，而我們國父更進一步用「知難行易」的學說，來啟發中國的民族精神，並用來實行他的革命主義。」<sup>⑭</sup>可知知難行易學說係針對當時苟且偷安，畏難却顧，對主義奉行不力的弊病而發。蔣總統追隨國父從事革命，所處時代既屬相同，時代對他思想的刺激與影響也是必然的。

自辛亥革命成功至抗戰勝利，凡三十四年為國民革命第二期，革命的對象是軍閥及軍閥所依以生存的帝國主義。革命的本質是民族革命，而其任務乃在撤銷不平等條約，打倒侵略強權，為國家爭取獨立自主的地位。這個時期在不平等條約壓迫下，民族之自信心與自尊心喪失殆盡，民族精神也蕩然無存。同時五四以後，個人本位的自由主義與階級鬥爭之共產主義思想，流行全國，一般學術界對於固有文化，只求其變而不知其常；對西方學說亦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義。因此襲取西方文化之糟粕與皮毛，喪失了對固有文化之自尊與自信。蔣總統則光大國父「發揚固有文化以固其本，吸取西方文化以廣其用」的主張，著述了「科學的學庸」，建立民族哲學。民國十三年後，日本躍居世界強國之林，總統研究日本致強原因，乃得力於我國之儒道及陽明「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哲學。且體驗國父倡「知難行易」學說的用心，乃提「窮理於萬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為其研究哲學之心得。

自抗戰勝利，國民革命進入第三期。革命的對象是共產國際第五縱隊的毛共，其本質是人民生活方式的社會鬥爭。亦就是民生主義以及民族民權主義的革命。戰後本可依建國方略的程序，實現建設的理想，使國民同享和平安樂的福祉。不幸共匪叛亂，摧毀八年抗戰成果，使我中華民族又陷入有史以來空前的危機，總統為復興民族，重建中華，以期團結全民力量，以對抗共匪的獸性暴行，並為了鼓勵力行三民主義以充實革命的實力，以奠定反攻復國的勝利基礎，遂將國父「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研究心得於三十九年公諸國人，指出日本立國精神與陽明哲學關係，並說明國父與陽明注重力行

的精神是一致的。此後他相繼發表「革命教育的基礎」及「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因此，力行哲學也構成了一個完美體大思精的體系。

#### 四、力行認識哲學之內涵

##### (一) 知行思想之發展

##### 1. 歐美知行思想之演變

知行問題是幾千年來中外學者所共同矚目的一個哲學問題。所謂哲學，希臘原文的本義就是「愛智」。因此，哲學在西方原是一種探求真正知識的活動。西方的哲學史，就是「生活觀」由客觀演進為主觀的一種有機體的發展史。西方哲學的發展，就是「生活觀」從客觀到主觀的一種有機體成長過程。古代研究思考問題，總以宇宙全體為起點，想要從外表去考察事物的相互關係。換句話說，古代的思想，首先注重宇宙本體論的研究。直到紀元前五世紀初期，哲人學派的出現，才注意到人事和社會的研究。哲人的意思就是智人。為了實際生活上的需要，鬥智爭辯和演說成為人們最迫切的知識和技能。所以「知」的問題，當時頗引起哲學家的注意，因而有「知識論」的產生。蘇格拉底首先確認「概念」的重要，反對「感覺」印象，尊重道德的標準，摒棄消極的懷疑。從前「宇宙論」「本體論」是偏重於「知」方面的研究，蘇氏轉而研究人生，偏重於「行」方面的研究。柏拉圖對於「人」的觀念，劃分理性與感覺兩種。亞里斯多德師承其說。中世紀很少人討論這些問題，到了法國笛卡兒倡導「先天觀念說」，創「惟理論」後，「知識論」遂引起世人之爭辯不已。其後斯賓諾沙、萊布尼茲、洛克、巴克萊、休謨、費希特、康德、孔德諸人對於知識問題，都有不同的看法：究其來源，有理性論和經驗論之對峙；理性論者以為真正的知識是從抽象概念的思想而得，感覺的經驗，只能供給混亂的印象。抽象觀念的思想，有一定的範疇，這種範疇，就構成理性，而理性乃與生俱來，並非從經驗中產生，這種主張，起於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他們認為「真正的知識」之取得，乃是理性的事，與經驗無關。十七世紀的培根和笛卡兒以及萊布尼茲都承認憑着理性可以認識絕對。笛卡兒認為一切知識，無待外求，只要從簡單自明的觀念演繹而生，所謂「我思故我在」就是這個意思。總之，理性論者以為理性是人人所同具的特質，與生俱來，無待外求。人類就憑藉着這種理性而認識客觀世界，認識絕對真理。所以他們認為求知，全靠理性的自內發動，無需感官作用。蘇格拉底之「產婆法」就承認他只能使人的知識更有系統、更明白，但是不能給人知識，所以他說「自認無知，才算是有知識」。他以為事物的本質可以用概念來表明，真正的知識是概念的確定，也是永恆的、普遍的。這種由理性產生出來永不變質的知識，其發自於主觀者為至善，其發自於客觀者為天理。所以蘇氏說的知識，表現於行為，便是道德，因此他以為「知識即道德」，而倡「知德一致」「福德一致」「知行一致」之說。

跟理性論持相反主張的是經驗論，經驗論者，以經驗為智識的起源，理性不足以為知識之根據。並認為吾人所有的知識，都來自後天的經驗，故經驗論又叫後天論。經驗論者以洛克、巴克萊、休謨為代表。洛克認為一切知識起源於經驗，而非來自天賦觀念。人心初生有如白板，沒有塗寫過什麼東西，只有經驗，才能使其獲取內容。外面的感覺，內在反省都是經驗的來源。巴克萊根據洛克思想，也否認天賦觀念，謂一切觀念，由知覺而生。故他有「存在即被知覺。」的主張。休謨講「印象」，謂思維的一切質料，都來自外在事物的感覺與內在心的反省諸印象。觀念由印象而生，無印象即無知覺。吾人所有之觀念或思想，都是印象的複寫，都原于知覺，都生於經驗。經驗以外為不可知的東西。

究其本質，有觀念論、實在論和現象論之鼎立。實在論最初是一種表白的思想，所謂知識，乃是指所知的外在客觀事物，對於知者之主張所表現的一種不變的自相。換句話說，宇宙萬事萬物客觀的存在，就是知的本質，這種本質正與吾人的經驗完全相同。誠然由經驗事物，可獲得的知識，但單以「經驗事物」來解釋又未免失之簡樸，忽視了「官覺的影響」的重要。於是新的實在論便起而修正其理論。新實在論以為知識不必即是客觀事物與吾人經驗完全一致的自相，在離開吾人而獨立的實在世界中仍存有，且於世界為人類所共有。因此知覺便成認知外在實在世界的唯一條件。觀念論者却不以為然，他們以為宇宙全體不能離心而獨立。宇宙的一切都不外是我自己的表象。若吾人對那些事物不去思維，就不能說他們為實在。一切事物，都是自己經驗所構造。巴克萊更認為知識是純粹主觀觀念的產物，故說「存在即被知覺」。總之，實在論謂知識是基於經驗而達於客觀實在的認識，觀念論謂知識是純粹主觀觀念的產物。

西方知行問題的爭論，到了康德才加以調和。康德的先驗論就是調和理性論與經驗論，以解釋知的起源問題，其現象論在調和觀念論與實在論之爭。康德認為知識之構成有兩種因素，一為先天的形式，一為後天的資料。形式本諸理性，資料來自感覺。有先天的形式，始有思維辨知，有後天的資料，始有感覺經驗。他又認為人類知識有感性與悟性兩種莖幹。感性供給悟性以知識之資料，悟性整理這些資料，以完成智識。康氏又認為知識的本質不僅僅限於觀念或實在，知識不是實在的真相，却是基於其現象而獲得的一些法則性。我們所能認識的，只有現象，不是物自體。物自體，可以思維，不可以認識。現象乃因物自體的刺激產生，非純主觀的產物，現象因為主觀能力所形成，同時亦有客觀之根據。這種說法，很明顯的在調和觀念論與實在論之爭。

康德不但注重知，而且還注意到行的問題。他將人的心理分成知、情、意三部分。他所著的「純粹理性批判」，乃是從事於事物認知之研究，這是屬於知的；他的「實踐理性批判」，乃是從事於行為決定的研究，這是屬於行的。他以為純粹理性的表現為悟性以求真為目的，以自然界為研究對象，這是知方面的研究；實踐理性的表現為意志，而意志在求「善」，以自由為基本原素，這是行的研究。如果自己已不為私慾所蔽，循道德行事，便能獲得精神自由，能見真我。然憑真我之合理的意志行事

，乃是意志的自由。由此可知，康德以知爲先驗的作用。是對自然界之事；以行是意志作用，是對道德的事，兩者嚴分爲二。顯然康德主張知行兩截說。然這嚴分爲二截的知行，由情的方面而貫通之。

知行問題，康德雖勉強以調合，但嚴格的說，仍不出哲學範圍，且其論多偏于知之本質與來源方面。自心理學脫離哲學而獨立後，人們對於知行雙方，才有明確的認識。康德以人的心理有知情意三種現象，好比人的五種官能一樣，其後馮德、吳偉士等心理學家，雖持各議，但知的研究實佔重要地位。現今的心理學，有兩大派別，一爲機能派、一爲行爲派，前者爲研究內部的意識，後者爲研究外部之行爲，各樹一幟，關於知行問題，都有獨到的見解。二十世紀以來，「行爲科學」的建立與發展，對行爲問題之探討已有輝煌的成就。

二十世紀的大哲學家杜威，也不免受到心理學發達的影響，他的實驗主義乃是經驗主義，行爲主義及進化論之產物。他把知識看成行動的工具。以爲知識作用在經驗中發生，在嘗試過程中改造，並且在行動裏表現其效用。然而發生、改造與表現全在於行，所以他也注重實行的價值。因實際的行爲與客觀的事實相接觸，才能獲得知識。他本諸實驗主義的理論，主張在經驗歷程中，「實行」先於「認知」，但「認知」也靠「實行」。所以杜威常說「行以求知」或「由做中學」。這是說由行動中求得知識，而知識也是靠「行」去完成。

從西方知行思想的演變看，雖着重知識問題的探究，但二十世紀以來，實驗主義與行爲科學的發展，逐漸轉向「行」的研究，所以對於認識的問題，不能單從知識方面來解決，必須靠力行來解決。

## 2. 我國知行思想之演變

我國知行的學說，創立很早。尚書說命篇載傳說對殷高宗武丁之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語，是知行兩字並用的開始。後世的人受了這種學說的影響，認定了知易行難之原則，其流毒所及，影響民族國家及社會人心至鉅，故我國周秦以來的社會風向，不但知而不行，更不求知亦不力行，遂養成苟安畏難的心理，習風既成，輕視知識，崇尚迷信，習尚空談，因循敷衍。由此可知知易行難之說，實是社會心理之大敵，國家民族之蠱賊。

孔子論知行，主張「知爲行之基」說，認爲由學而知，由知而言，由言而行，言行一致，以求人生理想生活之實現。因知是行之基，故說「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他以知識之來源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三種。因宇宙之知無窮，所以主張好學與學思並重，故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信不好學，其蔽也作。」可見求知僅思還不足，必學，思、習同時兼用，才能有成。大聖如孔子仍說：「知之爲知之，不

知爲不知，是知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足見求知之難。孔子論行，是以個人內心的原始動機，歸納出共同的原則，也就是以修己愛人爲範圍。所以說：「修己以安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些範圍都歸宗於道，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道不遠人」、「君子遵道而行」，都是說道是行的準則。然而道如何去行呢？孔子以爲「誠」是行爲的原動力，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就是指行爲靠「誠」來推動，同時行亦靠誠來貫徹，以達大公無私，推己及人的地步。

孟子師承孔子，主張良知行易說。他認爲人有四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仁義禮智根於心」。這「仁義禮智非由外鑠也，我固有之也。」他這種主張，可稱先天良心論。人具有四端，故能自動趨於爲善，因爲它是「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的知，良能的行都是先天的。而且這天的知、能，全發自於心，從心出發，故他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是人之神明主宰，性是心中所具之理，而天又是理之所由來，所以孟子主張盡心以知性，存心以養性，目的在順健而行，以達事天的任務，齊於天人合一。

儒家另一大師，荀子的主張正與孟子相反。他以爲人性皆惡，人之有善行全在偽作。他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可能，可事而成在人者，謂之偽。」又說：「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偽。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荀子所說的偽，並不是虛偽錯誤的意思，乃是「作爲」、「人爲」的「事實」，變作一種善的「價值」的意思。所以他認爲人性本來是沒有價值的，經過人爲的創造，才產生了善的價值。把自然狀態的內容，在於學禮。所以荀子勸學篇說：「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學至乎禮而止矣。」這就是說透過了禮，才能够創造出來價值。孔子是學思並重，到了荀子則特別注重學的價值。從重視人爲的創造出發，他更提出「制天命」的主張，在他的天行篇中說「大天而思之，執與物畜而裁之；從天而頌之，執與制天命而用之。」這種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才能打破自然的拘束；以自然爲材料去創造文化。由此可見荀子是如何地深切瞭解文化的意義，和重視力行的價值。

在先秦思想界中，除儒家外，墨家對於知行的詮釋最爲確切。他對知行的來源，分聞、說、親三種。聞知，得於間接之傳受；說知，係由已知而推及未知；親知，係出於親身目睹之經驗。他看重親知，所以也注重苦行實踐。不過，墨子所說的行，帶點倫理的意味，以爲見義勇爲，不好功名，才是一種眞行。因此他的刻苦耐勞，不慕榮華，言必信，行必果，苦心救國，以

匡時弊，捨己爲人之懿德，視死如歸之偉行，克難實踐，創造發明的精神，不但令人欽敬，更堪爲吾人師法。

宋代理學盛行，朱、程、陸、張諸子，對知行問題，均多所發揮，其中最足注意者，爲程伊川、朱熹二家。程子對知行之見解是「重知輕行」。二程遺書說：「古之言知之非難者，吾謂知之只非易也。今有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又說：「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終之……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鳥啄，人不踏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是不知。」程子對知行的先後，以爲「須是識在行之先，譬如行路，須是光照。」可見程子不但反對古代「知易行難」的說法，而且還說明了「能知必能行」的道理；頗似國父「知難行易」之原則。至於他論行的由來說：「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錮，力量不致，則如之何？曰：只是既知，若致知，則知識尙漸明；不會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這個意思以爲知爲行之先決條件，如事理一明，則行可隨之而至。由此很明顯地，程子是重知輕行的。

朱熹師承程子之說，惟對「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又說：「知與行工夫，須着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愈明；兩者不可偏，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便會漸漸行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行不得。」又說：「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此又較程子更深一層，並矯正「重知輕行」之流弊，以發揮知行並重之理論。同時他又說：「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他如何持久，也是空的。」「義理不明，如何踐履……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這說明行在知之後，如知不詳，則不能實踐，踐行也不能持久，這跟國父「能知必能行」的主張相同。

陸象山論知行問題，乃以心理之現象來決定，因知其所謂行，非去行，乃心理之變化；以心理之變化爲行，即以靜爲動，以不作爲爲作爲，以幻想爲求績。只重心理之知，不求身體力行。完全重知輕行，因此也流弊百出。

明代王陽明致良知之說，是以知行合一爲基礎的，他將致心之良知于意之所在事物上。「知而不行，是爲不知。」故良知的知，根本要從「致」的工夫入手。傳習錄上說：「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又說「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人只一個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即知即行，即行即知，知而不行，便是未知」，綜其說：一、能知必能行，能行必能知，故知行原合一。二、不行是沒有真知，沒有真知是由於不行，故知行原合一。三、行可得真知；得真知則即行之，故知行原合一。四、知是理想，行是實現。理想必可實現，若不實現則爲空想。理想必求其實現，實現必本乎理想，故知行原合一。五、知之是否正確，必以行來證明；行之是否錯誤，必準乎知的範圍，故知行原合一。六、知而不行，行而不知，都有偏見，故隨知隨行，隨行即可隨知，原合爲一。故王氏學說，完全以人生行爲爲主旨，而行爲的標準，則爲良知，所以「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

，這些行止生死的行爲，完全受命於良知，良知就是行爲的標準。致良知，就是實踐行爲的標準。

王陽明一派的理學，是明代學術思想的重鎮，但是演變到了末流，却發生了「虛疏之弊」，空談性命，口舌相爭，幾乎又蹈魏晉清談的覆轍。到了清代，就發生了反動的力量，提倡經世實用的學說。黃梨洲、王夫之、顧炎武等人，承宋學之根基，另把「致用」當作求學之目的，並倡躬行實踐之說。黃氏論學以「務博綜，求篤行」爲宗旨，主張學必推源於經術，證明于史籍，而以經世致用爲依歸。王氏爲學也以切於實用爲主。論知行，則以知以行爲功，而未可得行之效；同時行可言知之效，而不可以爲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略與國父「不知亦能行」，及總統「不行不能知」二語相同。顧氏論學則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爲宗旨，非常注意到「切實」、「致用」之學。到了顏元更富實利主義與啓蒙思想的色彩，漢儒的訓詁，魏晉的玄談，釋老的虛無，宋明的理學，無一不受顏元的排斥，他認爲這些學問都是消耗精神無益實際，都是無價值的學問。他以爲離開「實用」，就無價值；離開「事物」，就無學問。漢儒正其誼不謀其利的說法，他固然反對，宋儒高談性命的習慣，他也痛加排斥，顏氏的見解；跟實驗主義的思想很相近，實事求是，不尚空談，崇實務用，匡世勳行。

綜上所述，可見我國知行問題的演變趨勢，在求真知與力行之深義。

## (二) 力行認識哲學的本義

### 1. 認識哲學的一般理論：

認識是人之所以爲人的特徵，也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慾望，而人類的認識作用是一種心理歷程，先有兩種假定存在，一是認識的主體即能知，一是認識的客體與對象，即所知。認識就是能知（主體）與所知（客體）之間所發生的作用。主體認識了對象，要有所表示，說明認識的內容這就爲知識。對主體能够認識客體的本質上，連續產生了一聯串問題，諸如主體何以能知對象？對象的性質爲何？達到對象認識的限度何在？如何才能算是真正認識對象？這些問題都是認識論所要解決的。因此認識哲學所討論的主要問題，就包括認識的起源，對象，限度以及真理標準等四大問題。近代認識哲學把前三個問題適稱爲認識論或知識論，真理標準問題則屬於真理論。

### 甲、認識起源問題

人類從何而得到確實可靠的認識？什麼叫做確實可靠的認識？有些人以爲凡具有普遍妥當性，必然性的認識爲確實可靠。有些人認爲沒有這種認識，這只是幻想，認識只有相對性和蓋然性。那麼在認識起源問題上，肯定人類具有源自理性之普遍妥當與必然而確實可靠的認識叫理性論。否認理性爲認識淵源，而以一切確實可靠的認識，係來自人類之感官與後天經驗的叫經驗論。理性論與經驗論有長時期的爭論，這兩種不同認識起源論，影響到認識的範圍與對象，都得到相異的結論，此爲西方哲學思想界兩大對立的思想巨流。而後有批判哲學之先驗論來折衷調合，及至現代，又有實驗論加以批評。



理性論者認為一切確實可靠的知識，都來自人類與生俱來的理性，亦即來自不可否認的自明之理，知識乃此種自明之理演繹之必然結果。這種主張重視先天的理性，又叫先天論。西方的笛卡兒，萊布尼茲等為主要代表。笛氏認為人具有天賦觀念，一切認識都以此天賦觀念為依據，故曰：「我思故我在。」。萊布尼茲亦認為與生俱來的觀念是非常確實的。中國學者多主理性論，孟子的「良知」，張橫渠的「德性之知，不萌於見聞。」程伊川的「知者吾之所固有」，朱子的「人自生即有知識」，陸子的「心具理」，以及王陽明之「良知即天理」，「理在心中」等說法，都認為知識來自於先天的理性，都屬於理性論的主張。

經驗論者，否認有所謂自明之理之知識原則存在，主張以經驗為知識起源，人之初生，心如白紙，一切觀念都從感覺而來，心靈接受感覺印象，從而構成知識，理性不足以為知識根據。經驗感官是後天的故又稱後天論。在西方洛克、巴克萊、休謨等為代表。洛克認為一切知識起源於經驗，而非來自天賦觀念。休謨認為一切觀念，都依一定程序相互接連，中間有一定關係存在，我們的思想都依據起於感覺的類似，連續和因果三個原則互相接連聯繫者。所以休謨也以為一切觀念都來之感覺，決無天賦觀念或生而知之的知識及原理。我國學記上所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的主張，可視為經驗論。

康德的批判哲學提出先驗論的主張，調合理性論與經驗論的對立。先驗意指經驗的基礎，並非超越經驗，而是要確立經驗要確立經驗，就有先於經驗存在的知識要素。知識由經驗而起，但非由經驗而出，另有「純粹理性」為其基礎。所以康德認為知識由先天的形式和後天的資料兩種因素構成。形式諸理性，資料來自感覺。有先天的形式，始有思維判斷，有後天的資料，始有感覺經驗。這種主張很明顯調合了經驗論與理性論的爭論。杜威也想調合經驗論與理性論以解決三百年來的認識起源問題，而倡實驗論。他認為認識的作用須在實用性的行動中找尋淵源。人類認識的起源乃由於需要與活動。而具有實用性與行動性。觀念與感覺，經驗與理性不相對立，而是一元的連接，所以知識是活動的，適應實際生活而起。這種以「實行」來解決認識起源問題的主張，跟力行認識論的說法，相當接近了。

#### 乙、認識對象問題

在認識歷程上，對於我們所知的對象，有人認為是離心獨立的客觀實在，而主張實在論；有人認為是依心存在的觀念，而主張觀念論，有人認為是主客相交所成的現象，而主張現象論。觀念論者以為我們認識的對象乃是內在主觀的觀念，而非外界客觀實在。而外界客觀事務乃主觀觀念的顯現，且依主觀心意而存在。巴克萊的「存在即被知覺」的說法可為代表，王陽明所謂理在心中，物在心中，事在心中的說法也屬於同樣的主張。

實在論者則持相反的意见，認為我們所知的對象，離開認識主體而獨立存在，客觀事物獨立自存，不必依賴主觀心意而始成立。唯物論者都持這種立場，重視客觀事物。而且把人類腦海中的觀念，也看成是物質的翻譯。

康德爲了調合實在論與觀念論，而倡現象論。一方面承認客觀實物存在，一方面以爲實物自身，非認識對象，認識之對象，唯有主客協作而生的現象。以後德哲胡賽爾更倡行現象學，他認爲我們可由研究名詞作用而知思維之本質，思維與被思維之物的同一，即謂知識。這也是說主客觀的統一，認識始能成立。

### 丙、認識限度問題：

認識限度問題是研究人類認識世界所能達到的限度（範圍）問題。有人絕對相信自己的感覺或理性能够認識宇宙，被稱之爲獨斷論，有人極端懷疑知識，認人之感覺與理性絲毫不能認識宇宙之真相，被稱爲懷疑論。康德對獨斷與懷疑的論點加以調合，確定認識的妥當限度與範圍，被稱爲批判論。其後又有實證論者主張形而上學虛妄，只有實證的知識才可靠。

獨斷論者認爲人的認識能力，具有普遍性與絕對性，可以認識宇宙的真相。如斯賓諾沙認神爲統御萬有無限的存在，如能認識神，則一切萬有皆能認識之。其他如笛卡兒，萊布尼茲都以純粹思維說明超越經驗的實在，都屬於獨斷論。另外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的論證亦屬之。懷疑論者則否定認識之可能性，認爲人之認識能力，只有相對性和時空性，如斯賓塞以爲人只能認識現象界，無法認識本體界，康德跟比羅都認爲人絲毫不能知悉物自體，所知者限於現象。

康德轉批判的態度，考察可能之認識的根據與範圍，他認爲認識之可能僅限於經驗之範圍，形上學之本體或物自體僅能思維其存在而已，不可能認識。批判論雖認形上學本體之認識爲不可能，但在實踐理性之立場，又以爲實在及價值爲人類精神的要求，而有存在的餘地。故物自體又非認識不可了。

實證論者以爲認識之可能僅限於經驗之範圍，超出經驗的範圍，則其認識爲不正確。如孔德以爲認識之範圍僅限於現象界的因果關係。現象以外的本體，已超出人的認識能力無法認識。穆勒認一切知識成於經驗。不經驗個體事實，無由得到概括通則，可見實證論一方面承認認識能力及於現象界，一方面否認認識能知事物之本體的主張也在調合獨斷論與懷疑論的說法。

### 2. 力行哲學的義蘊

#### (1) 行的義蘊

蔣總統說：「『行』與『動』是不同的。『動』並不是『行』，而『行』則可包括某種的『動』在內。行是經常的，動是臨時的；行是必然的，動是偶然的；行是自發的，動則多半是他發的；行是應乎天理順乎人情的，動是激於外力偶然突發的。所以就本體言，『行』較之於『動』更自然更平易；就其結果和價值來說，動有善有惡，而行則無不善。行是繼續不斷的，動是隨作隨止的。」<sup>⑭</sup>「『行』與『動』應當分別清楚，行是循着軌道朝着目的和方向，繼續不斷，川流不息地，無時無刻，不在他進程之中向前進行的。」<sup>⑮</sup>可見行與動是有區別的，行發自天性，動起於人欲。易經上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裏所謂健，就是歷久不衰，經常不變，最剛強，最持久，而且也最圓貫。行又是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本然的天性，所以就宇宙講，

行乃本諸天理。所謂天理是指自然而然不雜人偽的道理；就人生講，行是人生本然的天性，那麼，人之生是爲行而生，人之行也爲生而行。可見行就是宇宙，行就是人生。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間，沒有一天可脫離行的範圍。而且行的意義是不分動靜的，整個的行程中間，工作是行，游息也是行，作事是行，修養也是行。行是無分動靜的，「從跡象上看，雖然亦有動有靜，但在整個行程中，向外表現發展的時候，固然是行，生機潛蘊成長的時候，也是行，只要合乎天理，順乎正軌，動亦是行，靜亦是行。」<sup>⑭</sup>所以「古今宇宙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sup>⑭</sup>

## (2) 行的法則

「我們力行的時候，應該要知道行有行的法則。所以必須具備下面的要件：(一)必須有起點；(二)必須有順序；(三)必須有目的；(四)必須是經常的，恆久的。」<sup>⑭</sup>可見起點、順序、有恆與目的四項爲行的法則。所謂有起點，就是說，我們在規定計劃之始，要找到從何處着手，在起處立下成功的根基。行不但要有起點，還要注意輕重緩急，循序進行，然後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這就是順序。大學上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便是如此。行的第三法則是恆心，就是耐心或持久力，這也是做事成功的主因。大凡沒有恆心的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途而廢，永難達成目的，終於一事不成。我們要達到有志竟成的目的，就不可以不立志有恆自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便指此意。最後，行必有目的，「所謂目的，就是說我們必須有光明的目標，目標確實了，朝着這個方向灼然不惑的向前做去。我們無論担任或大或小的工作，必須在總目標下，定出我們工作目的，我們每件工作入手之始是起點，而目的就是我們這件工作的終點。我們要抱定目的一心力行，不達目的決不終止。」<sup>⑭</sup>

## (3) 行的動力與要素

蔣總統在行的道理中，以智仁勇三達德爲行的要素，誠爲行的原動力。「誠者物之終始，所以我們行事只要以至誠去力行，就必能篤行實行，這樣的行才能事事精益求精，實事求是，始終如一，貫徹到底，就決不會有粉飾張皇，苟且敷衍的習氣。這樣的力行才能不畏難。惟有不畏難去行就覺得行易，所以力行才是行易。」<sup>⑭</sup>，誠是行的原動力，「誠者成也」，「不誠無物」，如果人生沒有誠，則智仁勇三達德，也無從發生，無從表現。

## (4) 行的目的

行的目的就是在於行「仁」。革命的目的也是行「仁」。蔣總統說：「革命的動機是救人，就是利他而不利己；革命的本務是行仁，就是愛人，而不是害人。」「仁是本乎大公，出乎至誠，所以知之出乎誠者必智，行之出乎誠者必勇，智者之知必知仁，勇者之行必行仁。」「發揮我們的良知良能，決心力行，坦白勇敢，一往無前，充其行之極致，就是殺身成仁。……：古人所謂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這是我們力行的本義，這樣力行，就是革命，亦唯有真正革命的行爲，方能表現力

行的意義。」<sup>(14)</sup>

### (5) 力行哲學的意義

從上面的說明，我們可以知道，蔣總統所謂「行」，乃是出於「致良知」的行，實現良知之行，本良心而行之行。同時也是受過知難行易說的洗禮的行。由行以求知，因知而進行的行，亦即有主義，有信仰，有仁心，有誠意之行。簡言之，行的道理的行，融會了國父的學說，陽明的道理，以及中國民族的傳統精神而發明的哲學體系。所以力行哲學是以「行」為中心，以行解釋宇宙，以行批導人生，以行究明知識，以行講求方法，拿行來貫通一切，創造一切，用一個行字來勉勵大家實踐力行。正如蔣總統所說：「行無分動靜」，「行則無不善」，「宇宙根本由它自身的行而創造出來的」；「行就是人生」，「致知在於力行」，「不行不能知」，「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sup>(14)</sup>「完成救亡復興的偉業，只有從力行中去實行三民主義。」故以行為中心建立的哲學為力行哲學。

### 3. 力行認識哲學的意義

力行哲學的行包括知在內，換言之，行乃知行合一之行，非離開知而獨立之行，非盲目冥行之行。所以行是與知合一的。知行二者，本相依而成，相輔而行，相需為用，相得益彰。兩者關係十分密切。下面分兩方面說明：就知行的起源說：

(1) 知以導行，行以驗知：行中常有知在，知中亦有行存；倘若行中無知將變為盲動；知中無行，便非真知實學。故朱熹說：「聖人說知便說行。」「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知與行功夫須並列着，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愈明，二者皆不可偏廢。」「知行之相需為用及其複雜關係，竟至如此。我們須兼顧知與行，由知導行，因行求知。國父所說『能知必能行』，『以行以求知，因知以進行。』實知行並重而求其統一發展。」

(2) 知可勵行，行可喻知；知可勵行，就知而言，乃是知為信之始，信為行之始。常言道「博學而篤志」，博學為求知之事，篤志為力行之事。博學為篤志先鋒，篤志又為力行之要素。有其學始有其志，有其志始有其行，因果相生，不可或爽。故宋儒程伊川遺書十五上說：「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國父也說：「先有了學問，便有了智識，有了智識，便有了方法，有了好方法，就馬到成功。」至於行可喻知，乃就行而言，即所謂經驗之獲得。國父所謂「行而後知」，蔣總統說「必須實行後而後有真知，也惟有能行而後知。」此即行可喻知的道理。

就知行的作用說，知為行的領導者，幫助者，改善者，行為知的模倣者、完成者。知為行的指南與標準，行為知的實現與證明。知是行之主義，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行以求知，知以導行。知靠行來充實、發展，行藉知為指導、決定。知行猶車之雙輪，人之兩足，永遠相輔相成。

知行的關係雖十分密切，但仍產生分合、輕重、先後、內外以及難易等問題，儘管先哲所言各不相同，要皆針對時弊，而

一以力行爲主旨。故力行認識哲學即以行來解決認識上的各種問題。換言之，認識論上所產生的起源、本質、限度及真理標準等問題，全可因「力行」而得到合理妥當的解決。

### (二) 力行認識哲學的要旨

力行認識哲學的主旨全在說明「以行統知」。包括五大命題，第一是知源於行。第二知顯於行。第三知擴於行。第四知準於行。第五知成於行。這五大命題的要論，乃構成力行認識哲學的完整體系。今將其要旨略述於后：

#### 1. 知源於行：

這是有關認識的起源問題。在西方有經驗論與理性之爭，力行認識論則兼收二者之長，而一以行字貫之，主張知源於行。國父在軍人精神教育中有明白的說明。他說：「智何由生？有其來源。約言之，厥有三種：一由於天生者，二由於力學者，三由於經驗者。中國古時學者，亦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之說，與此略同。」蔣總統亦同此主張，在軍人精神教育釋義訓詞中說：「智之由於天生者，例如孝父母，知廉恥……都是與生俱來的本能，不待學習，乃生而知之。……其次，由於力學者……再其次，由於經驗者……總之，一個人之知識，必綜此三者而來，亦由此三者之相互增益，然後可以成爲卓越的知識」。

國父與蔣總統所謂「天生者」，略同理性論者所謂之理性，「經驗者」即同於經驗論者所謂之感性，至於「力學者」也等於實踐。由此觀之，力行認識哲學主張「知源於行」是先天與後天並重，亦即理性與經驗並重。吾人不能否認人類知識有生而知之者，如良知良能，心性之知，天賦才能以及是非惻隱之心等等，無一不是生知的智慧能力。而且經驗之爲人類認識之來源也很明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做萬件事，行萬里路，所經歷之事愈多，知識也越廣。至於力學對認識能力發生之作用，當無疑問。雖然認識有天生、經驗與力學三種不同的起源，但進一步分析，又均由力行而獲得。所謂天生之知，實爲祖先由生活習慣或行爲所獲得的知識，及其變爲本能而遺傳後代的。所謂力學之知，也是他力行所得載於史籍或傳誦的。所謂經驗之知，更是個人在力行中所發現的了。所以三種之智，均由力行而來，行字貫通一切知識，力行爲我們認識能力的總根源。蔣總統說：「不行不能知」，「要解決知識的起源問題，也唯有從力行中去求。」<sup>⑭</sup>這就是力行認識哲學的知源於行論。

#### 2. 知顯於行

這是有關認識的本質問題。也就是認識的對象問題。在西方有實在論與觀念論的對立，力行認識哲學亦兼取二者之長，以「行」統之，而主張知顯於行，綜合了主客二觀，完全說明了認識對象關係。蔣總統說：「一個人生在宇宙中間，終日因緣接觸，都離不了事與物，在心與事物微妙的關係中間，我承認一切都要從事實上客觀上來決定。」因此有生物現象，才有生物學的產生。這就肯定事實產生理論，存在規定思維之證明。但他又說：「我們開始研究一件事物，在我們腦筋當中，首先發生

出來的，就是這件事物有關的許多概念，但概念不是由外面裝進我們腦筋裏來的，而是我們心靈對於外界事物的印象所發生的一種理智活動結果。所以概念必求其正確，然後思想才不致錯誤，有了正確的概念，就可以憑概念來判斷，以明瞭事物的性質和真象。」<sup>⑭</sup>這就是說人類主觀的思維意識對客觀事物的反映不是機械的，而是要加以判斷選擇以達正確要求。知識的本質，在於判斷，無判斷即無知識。認識是一種複雜而完整統一的思維判斷歷程。我們決不能離開心意作用而只認外物為認識的本質。認識非由內而外的投射，也非由外而內的反映，乃內外合一的攝映。認識的目的不是反映外物，而是攝影外物以指導行動。人生是行，我們對於一事要明白了解，全在有其應付方法的行，則知乃顯於行。這就是 國父所謂由行而致知，因知以進行的本意。由上觀之，存在決定思維，思維也能決定存在。用 蔣總統之意說，就是事物決定心意，心意也能決定事物。事物決定心意是認識的過程，心意決定事物是實踐的過程，其關鍵全在於行。因為客觀實在與主觀的觀念，都沒有自動性，必發揮行的效力才能產生作用。所以力行認識的本質，是在求客觀與主觀的合一，亦即實在與觀念的融合來說明認識本質上的關係。總之，認識的本質在行，致知顯於行。

### 3. 知擴於行

這是有關認識的界限問題。在西方原有獨斷論與懷疑論之爭，後有實證論折衷調合。獨斷論者認為我們的認識能力可以認識一切，持無限論。懷疑論者認為人的認識能力有限，不能認識宇宙普遍的真理，持有限論。實證論者則以認識之能力僅限於經驗現象的範圍，如超出了經驗之範圍，則其認識為不正確。力行認識哲學則主張實踐的，要以實踐的工夫擴張認識範圍，由有限擴至無限。以時代言，實踐是有限的，因而認識也是有限的。但從整個歷史發展言，實踐是無限的，因而認識也是無限的。由於有限只可認識相對真理，由於無限，可以認識絕對的真理。所以力行認識的範圍，是由認識相對真理而到認識絕對的真理。蔣總統說：「天下的事物都有它的一定道理。如果一切道理不明白，一定是體察研究的功夫沒有作得完密周到。所以大學教我們研究一切事物，就要根據已經知道的道理，再一步一步來推究不知的道理。直到完全明白為止，這就是即物窮理的根工夫。如果繼續不斷的推下去，時間愈久，瞭解事物道理愈多，自能組成一個完整而有系統的知識，對事物的外形、內容、現象、本質無不周知洞達。」<sup>⑮</sup>這裏所謂根據已知道理來推知未知道理，可以說是認識由有限到無限的。其所謂即知窮理的工夫，繼續不斷用下去，經時間上的考驗而能把知識普遍的組成瞭解貫通事物的真理，這就是說認識是由有限的到無限的，相對的真理達到絕對的真理的境界。所以 國父說：「宇宙的範圍，即知識的範圍」。蔣總統也說：「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其間萬事萬物，都可為我們人類聰明所利用。我們要征服自然，取用萬物，因此天地間一切事物，都要在我們研究之列，即宇宙之範圍，皆為知的範圍。」<sup>⑯</sup>宇宙的範圍既然都是認識的範圍，以時空來說正是有限到無限的。但是，宇宙是智的範圍，也是行的範圍，唯有力行才能擴充認識的界限範圍。蔣總統說：「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行字才可以創造一切。」故知擴於行。

## 4. 知準於行

這是有關認識真理的標準問題。在西方有符合論、直覺論、融貫論、實效論種種不同的主張，各有所見亦各有所偏。直覺在明、融貫在通、符合在適、實效在用，明通適用，四者融貫起來，理論與實際溝通，才可把握充分的真理。力行認識哲學認為知識從行來，真知識更從行而來。行不僅指動作，而且指「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的歷程，也即是由可能轉為現實的發展歷程。因此行中有知，知亦有行，真實的知識必來自行。吾人能行與否，吾人行得通不通，不只是知識的方法問題，且為知識的理想或真理。那麼，行就是認識真理的標準。依據行的認識標準看來，哲學上各種真理的標準都有長短優劣，從大的方面講，實驗主義的真理論偏重滿足主觀的要求，唯物主義的真理論偏重依從客觀的規律。從小的方面說，真理論中的融貫論認真真理乃觀念之調合一致，而非與物的實在一致。直覺論認真真理有如數學的自覺自明，即真理有真理自身標準而不必另找證明。符合論認真真理乃與所知的原物相合或相應。實效論認真真理即有用，無用等於零。這些顯然都有所偏或以一概全之弊。真知識的標準應全包括真實的對象（符合論），真實的方法（融貫論），真實的動機（直覺論），和真實的效用（實效論）四方面，四者缺一就不能達到真理的標準。然而今日瀰漫着馬克思主義實踐論，不少人趨之若鶩，實不知馬氏之論大不妥當，馬克思說：「人類的思想能否認識客觀的真理，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人類從實踐中證明其思想的真實性。」實踐雖可為認識的標準，即行雖可為知的檢證，但行對於知的關係，只是一種必需條件，不是像馬克思所主張的充分條件。國父以為知是行的必需條件，故行了也未必可知，那麼實踐也未必能認識，所以知才難，馬克思主義者謂實踐即能認識，竟將行對於知的關係，看為一種充分條件，實是武斷的不妥當的。不行不能知，和行而未必知才是力行致知論的精髓。這種力行致知論包含了上面所論四項真理標準，所以它是完整妥當的。中國哲學的最高準繩即在以人道配天道，則總以人道為知之目標，因此中國哲人特別看重知識在德性上之地位和知行問題。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則知天也。」這裏，所謂好、樂、盡，都是看重行為，欲由行以顯知識之究竟。西洋哲人則視宇宙之實在即為真理之本，因此對認識真理的標準論點，才各有所偏。國父為求知行問題謀一總解決，一方面不悖西洋之所謂知，一方面又須顧及我國傳統之文化精神，特創「知難行易」學說為其政治主張之哲學基礎。他以為知識並不是非艱，行才是非艱。蔣總統更發揮「知難行易」學說，倡力行哲學，故力行哲學在哲學上仍是一種最合理、最妥當、最有系統，也最偉大的力行致知論，或力行認識論。

## 5. 知成於行

這是有關認識的原素問題。國父所倡的知難行易說是屬於力行的認識論，它不同於純物觀主義客觀主義的辯證唯物論，也不同於笛卡兒和洛克諸人的三端認識（先肯定心物兩體之存在，再把吾人直接認識的現象世界貶斥到附產品的不重要地位）

，更不同於康德的兩端認識論（把人的認識分爲形式與內容兩要素，前者先經驗而生，後者由經驗而來，兩者必相需以爲用，而後知識得以成立，這樣把能知與所知劃分爲二，是二元的；本體也不可不知，近爲思想界反對）。力行認識的原素是能知與所知是內外貫通的，是心物合一的，也是主客交流的。這種認識論只是一端的，這是行：即是力行哲學之行。這個行，因爲一方涵攝「能知的智力」與「所知的事實」，故能統一人的內界與外界，精神與物質。另一方又涵攝「由行以求知」和「因知以進行」，故又統一人的經驗與理性，後驗與先天。因此不同於唯物主義的「實踐」認識論，和實用主義的「實行」認識論。

力行認識哲學把認識論上的各種根本問題，皆一以行字貫之，以行統知。就是知源於行，知顯於行，知擴於行，知準於行以及成於行，因而建立了力行認識哲學的完整體系。認識論與知行論全以行爲中心，因行而解決。所以 蔣總統說：「我們只知道有一行的哲學」。

## 五、結語

心理建設的精神動員爲推動三民主義的原動力，所以現階段心理建設的策進乃在建設民族心理發揚民族精神爲反攻復國的動力。然而知行哲學爲心理建設的精神動員之成功基礎。因爲知行哲學是哲學上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問題，知行問題不能得到圓滿確切的解決，心理建設也無由完成，那麼革命建設的工作也永無成功之日。國父體認到心理建設工作的重要乃著「孫文學說」，倡導知難行易學說，以確立國民心理基礎，堅定信仰，眞知力行，以實現三民主義。蔣總統繼承國父遺志，領導革命，闡揚知難行易學說與我國道統思想，創立力行哲學。其目也是一樣的。力行哲學是以一個「行」字來說明一切，貫通一切和創造一切。換句話說，哲學上所探討的本體、宇宙、認識與人生等問題都以「行」來統整、說明、融貫與解決。行就是宇宙，行就是人生，行就是革命。同時對認識論上的起源，本質、範圍與真理標準問題，也完全以一個「行」字來解決來說明。「行以統知」不但解決了認識論上紛爭的問題，也解決了知行關係上所造成的先後、輕重、內外、分合以及難易問題。因此知源於行，知顯於行，知擴於行，知準於行及知成於行就構成了力行認識哲學的完整體系。現今我們必須體認力行認識哲學的內涵，才能重振力行精神，打破畏難心理，增強革命的信念，貫徹革命建國的目的，確立心理建設的基礎，以促進三民主義自由安全社會的實現。

## 附註

1 國父：民權主義一講。

統：革命教育的基礎。



- 3 蔣總統：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
- 4 蔣總統：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
- 5 蔣總統：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
- 6 蔣總統：青年爲學與立業之道。
- 7 蔣總統：革命哲學之重要。
- 8 羅光先生：儒家形上學。
- 9 禪宗：指月錄。
- 10 蔣總統：中國之命運。
- 11 蔣總統：「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之綜合研究」。
- 12 蔣總統：何謂科學的羣衆時代。
- 13 國父：革命之方略。
- 14 蔣總統：行的道理。
- 15 蔣總統：訓練目的與訓練實施綱要。
- 16 蔣總統：科學的學庸。
- 17 蔣總統：軍人精神教育釋義。